

抗戰期間重慶金融鉅子康心如

● 雷穎 (彩色圖照刊第二頁)

我國曾為抵抗日本之侵略抗戰八年之久，當其時，舉國同仇敵愾，全民投入抗日工作，堅壁清野，燬家輸捐，是我中華民國全國上下最愛國、最團結、最努力、最能為國犧牲的一段期間，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均經傳流於世，實在是是我國立國以來最光榮的史頁。

抗戰軍興、定重慶市成為

戰時「陪都」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發動侵華軍事行動，揮軍強佔我東北三省，繼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引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於焉展開。我全國軍民群起投入抗敵工作，在「以空間換取時間」的

戰略指導下，全民一致進行焦土抗戰奮勇殺敵，誓言與國家共存亡。當其時我適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親自經歷了這一段歷史，參與了此一項神聖偉大的救亡圖存工作。八年間曾目睹無辜的同胞流離顛沛，因為戰爭所遭受的慘痛經歷，也見識到軍民將士拋頭顱、灑熱血奮勇殺敵的英勇事蹟，強敵節節入侵後，政府因為戰亂轉移到四川省重慶市。重慶位於長江與嘉陵江兩江會合之處，地勢險要，對外交通除兩江航行並以公路連接成都平原之外，尚有白市驛與珊瑚壩兩座機場。當時因為中央政府轉移至此，已經成為全國政治、經濟、金融、文化中心，並且由於中華民國全體軍民全面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軍閥的無理侵略

行為，震驚國際也已成爲舉世聞名之地，而政府因戰亂，曾將中央政府隨戰局轉變而轉移，又不便立即宣布遷都，時有一位有識之士，有鑒於此，以爲可以一個既合時宜又能將政治中心合理轉移的名稱「陪都」稱之。乃向當時國家領導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建議，定重慶爲戰時「陪都」，作爲國家中央政府之所在地，此項建議當即得到蔣委員長之欣允首肯，並即時正式宣布：定重慶市爲戰時「陪都」。這位有識之士就是我的二舅康心如先生，他是當時重慶美豐銀行的總經理，銀行公會的理事長，並爲重慶市臨時市議會的議長，也是重慶市金融界鉅子，此舉是他就任議長後所作的第一件事，促使政局穩靜、

民心安定。

二舅康心如

我的外祖父康壽桐生四子四女，他對子女教育十分重視，將四個兒子全部送到日本留學。我的母親是長女，自幼隨兄長們讀書習字，故亦能詩能文。大舅康心孚（兄弟等均以字行）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與孫中山同為同盟會會員，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邀他任總統府秘書，他不願為官而往北京大學教書。

二舅康心如自幼聰穎，敦品勵學，十一、二歲時即開始閱讀新書新報而獲取新知，十六歲考入成都客籍中學堂，更進一步涉獵孫中山之革命新思想，致有滿腔熱血，立志投身革命，並大膽開設「粹記書莊」，除經銷石印碑帖一類文化用品外，主要在推銷「民報」、「革命軍」、「黃帝魂」、「三十三年落花夢」等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書刊及珂羅版畫冊等。店面雖不大，但用意在藉此結交同志，已能小有成效。稍長後，外祖父將心孚、心如、心之、心遠四兄弟陸續送至日本留學深造。二舅隨兄長

心孚進入早稻田大學，選讀政治經濟科，並經兄長介紹亦加入了國民黨。在日本留學期間，以一種深沉的民族責任感，潛心研究世界強國的政治經濟理論，特別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的發展和變化。瞭解到日本各大資本集團對國家發展的貢獻，故對三菱、三井式的經營方式進行深入的研究，很有心得。

重慶大鹽商鄧芝如赴北京，欲尋覓一外商合作開創銀行，鄧與康府本有淵源，在北京就住在康家。事有湊巧而促成了鄧芝如及康心如與上海美豐銀行的總經理美國人雷文合作而創立了重慶美豐銀行，鄧芝如出錢，康心如出力，雷文出名，以康心如的學識能力及鄧芝如的財力，重慶美豐銀行在重慶金融界乃漸入佳境，二舅康心如並在心之、心遠兩弟自日本學成歸國後，安插在美豐銀行善加培訓，康氏兄弟遂漸立定腳跟而出人頭地，至抗戰開始時已經成為重慶市的金融鉅子。

二舅與我

我的母親康寶瑛，字晚民，是外祖

父母的掌上明珠，極受鍾愛，與四位舅舅亦親愛異常，由於母蔭四位舅舅均對我十分關愛。母親因身體欠佳，染上肺結核症，需要長期休養，外祖母特地將她接回北京娘家就醫並靜養，父親當時正為創業致力於煤礦事業開發工作，所以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成長，直到小學畢業。母親雖在病中，但對我的管教並未鬆懈，所以我在北京女師大附小與孔德小學就讀期間成績很好。母親在我剛進初中時往生，我更奮發上進，插班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初中二年級。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時，我正是天津南開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七月廿八日南開中學被日本轟炸，校舍半燬，學校師生許多人轉到大後方四川省重慶市的兄弟學校「南渝中學」就讀，南渝遂亦即改名為「重慶南開」；我也即轉學到重慶市郊沙坪壩南開中學，繼續唸完高二及高三課程，畢業於重慶南開中學，繼而以對抗日戰爭的高度關切，及比一般中學生體會更深切的愛國情操，捨棄了一大學統一招生」錄取的學籍，而考進軍政部兵工學校大學部造兵學系，期學以

致用報效國家，在校苦讀五年（軍事入伍訓練半年，正式大學課程四年，兵工廠實習半年），抗戰最後一年半中正式投入了戰地兵工勤務工作。

我雖在外婆家長大，但與三位舅舅（大舅康心孚在我出生前半年已往生於北京大學教室中）接觸不多，直到抗戰開始，遷至重慶，自己身經戰亂，經年與流亡學生為伍，假期中則寄居在二舅康心如家中，使我成熟許多，也開始與二舅接觸頻繁，他對我的瞭解漸深，並知道我就學情形與在校成績，對我更加疼愛。當時他在事業上已大有成就，並重視教育工作，曾捐鉅款給重慶南開中學，建立「忠恕圖書館」是以大舅的學名康寶忠與二舅自己的學名康寶恕為名，取忠恕二字，以留紀念，我在高二高三就讀於重慶南開中學時經常在忠恕圖書館作功課，心中倍感親切，二舅當時已被選為南開校董，對學校日後的發展十分關注，對我時有垂詢，我均照實提供學校發生事件的實情和背景，因為我畢業後仍在沙坪壩念大學四年，與在校同學和師長又均熟稔，所以仍能作二舅

的資料搜集員，使他隨時瞭解學校情況，在董事會中時有建言成為最有貢獻的校董。

我經常與二舅詳談諸多事件的種切，他對我的觀察與分析能力以及解說與表達能力十分欣賞，曾再三誇獎和鼓勵，對我在學校的學業與課外活動情形也都非常清楚，十分高興。我的父親與繼母不在重慶，時已遠赴西昌（西康省），故二舅主動的接管我的教育與保健，在生活方面，我仍和一般流亡學生為伍，父親是政府公教人員，故我的生活費用並不多，而我仍能與同學們打成一片，並不以為苦。二舅在日常生活中，時常藉機會在經濟上給我資助，並適時為我添置日常衣物，他對此事拿捏十分精明，尤能注意到不影響我父親的立場和尊嚴，實在使我心存感激。

抗戰八年奮力圖強

抗戰八年期間，是三舅此生最奮發、最如意、事業與生活都達到最高峰的一段時期。也是我與他舅舅之間感情與身心交流最豐富的一段美好時光。至抗

戰勝利，國民黨退出大陸，他遭共產黨整肅被撤銷一切職務，一九六〇年十月「摘帽」，一九六一年遷居北京，一九六九年病逝，享年七十九歲。十二年後才得到平反，於一九八一年正式在重慶市召開追悼會，家屬都到場，惜已時過境遷於事無補（只是退還了一部分錢），一切也已無從再說起了。

我於抗戰勝利隨政府遷台後就與二舅失去聯絡，在我的記憶中，只有抗戰八年中的經歷和情誼，才能一記，這也是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一段史蹟。

重慶美豐銀行因有四川省主席劉湘的支持，以及金融界強人劉航琛的合作，以及所有重要軍、經人物的關注，而業務蒸蒸日上。二舅是以「處世溫和、善結人緣」著稱，他自己也常向人說他的處事哲學是「寬以待人、從容辦事、忍耐待時」。他雖然平步青雲，有錢有勢，卻不飛揚跋扈，以勢壓人。在業務上一向恪守信用，以「一諾千金」作為他行事的座右銘，他並善於識別人才，選用與重用人才，基於這些條件，美豐銀行的業務和他的個人成就也越來越發

達，資本也愈見雄厚了。

三十年代末期，就當時的重慶工商金融界人士衡量，康心如之飛黃騰達，是他勇於學習外國大企業的經營方法，他又有科學頭腦，開闊的心胸。自一九三九年起，他有計畫的創立「豐」字號多種業務的子公司相互支援，聲勢大起。並先後起辦了經營進口業務的德豐公司和兆豐公司、經營出口業務的寶豐公司、經營房地產業務的華豐公司、經營農產品的新豐公司、經營運輸業務的群豐公司等。這些子公司的經理人皆是康氏兄弟及其訓練有素的美豐銀行高級職員。通過二舅的投資宏圖，可以看出他在當時着意發展實業的雄心壯志。可以說，在那時的重慶，凡工商企業、經濟金融等各方面都有康心如的貢獻。抗戰初期他還和錢心之、張肖梅先生等聯合發起組成西南實業協會，以資助西南各地實業發展。

對日抗戰八年，二舅康心如確實是享譽一時，資本雄厚，但是他是以振興實業提高國家的經濟力量為目的，也是以國家的強盛與人民的生活福祉為鵠首

。我日常見他不停的接見工商界名人，政軍商界的知名之士與政府高階層人士交往密切，當年黨國要員于右任和邵力子等人連家帶眷經年住在我三舅康心之家中，還有名報人張季鸞，是蔣委員長極信任並重用的報人（大公報主筆），因是陝西同鄉，都與二舅非常接近，也充分表現出他敬友愛國、效忠政府之丹心。他的經濟力量當時也確曾在多方面為政府所重用。

我自南開中學畢業考進兵工大學部，他曾詳細查問兵工大學部的教育程度，對師資、課程有所瞭解後十分贊同，並支持我投入於兵工事業以申我直接抗日報國之志，他曾說：「等雷穎造出槍砲，打死日本人的時候，我就……」稍頓一下「我就去『死』！」這句話使我震撼不已，當時幾乎流下淚來。這是多麼嚴重和傾心的一個期望、一種勉勵啊！也表示二舅對日本無理侵華的痛恨！

允文允武廉正自持

抗戰八年之間，我有六年在沙坪壩唸書，時常在週末與假期中在重慶市中

心鄒容路（前名柴家巷）國泰大戲院對面的康府大宅院中度過假日。對當年軍政人士及金融界大老們所過的優裕生活有機會見識一、二。康府的大宅院是二舅花了十萬大洋購自一個周姓人家，正房是一座兩層樓的大樓房和許多附屬建築。正房有開間極大的二十間房間，附屬建築另有多種不同的房子數十間，有足夠數十人享用可作舞廳的大客廳，有鋼琴、音響設備及設置在窗外如大書桌大小的冷氣機，可向客廳中吹送冷氣，另有彈子房與餐廳。我二舅平日生活嚴謹，不嫖、不賭、不歌、不舞，除了抽雪茄煙外別無其他嗜好，飲食方面也不喜油膩食物，平時也不喝酒，這些設備全為交際應酬，招待賓客之用，因此，逢場作戲聲色犬馬的活動雖然難免，也非他之所好，但是他却樣樣精通也都深黯其中奧妙。

以「賭」來說：每逢過年，他都參與家人與賓客們的賭局，他總是先拿出一大把鈔票，說：「我來把這些錢都輸給大家吧！」晚輩和孩子們歡聲雷動，於是他端坐莊家之位賭起「單雙」和「

牌九」，其動作之純熟，氣魄之雄偉，加上賭場上慣用的言語和名詞，使人感覺真如置身賭場之中。在重慶市柴家巷康府大宅院的常客中除了政治、金融界的大老們之外，抗戰期間曾為政府敵後情報工作出力甚多的幫派大老杜月笙先生亦常在座，曾有傳言說，在康府的一場賭局中「康心如把美豐銀行輸掉了」這種傳言，真是不值識者一笑的荒唐話。但此事我確有所耳聞，其實輸者不是康心如而是我的四舅康心遠，數額雖不小，但在這班賭客心目中並不算什麼了不起的巨額，更不到一座大銀行，杜月笙深知賭局中人雖不認為是驚人之數，但傳到市上則會引起許多「謠傳」，對在座大老們都不好看。

再說，在康府中猛贏康府的錢亦非佳話，更何況他與康氏兄弟交情至深，大家亦並不平這樣一筆錢，於是當眾兩手一攤，說聲：「今天只是隨便玩玩，一概不算數！」隨手將桌上賭具和籌碼一併抹散，大家哈哈一笑，一場賭局就此湮滅。

再以「戲」來說，我自幼生長在北

京（出生時國府尚未遷都南京，故而北京當時尚未改稱北平）喜愛京戲也能唱幾段，曾自稱是京戲留學生（留聲機學生），二舅對京戲瞭解非常深入，他一句北京話都不會講，只有滿嘴成都味的四川話，但說起京戲卻使我吃驚不已。有一次我和幾位朋友在二舅家中清唱消遣，一個朋友拉胡琴，但琴藝不佳，有時「過門」不清不楚，有時完全「托」不住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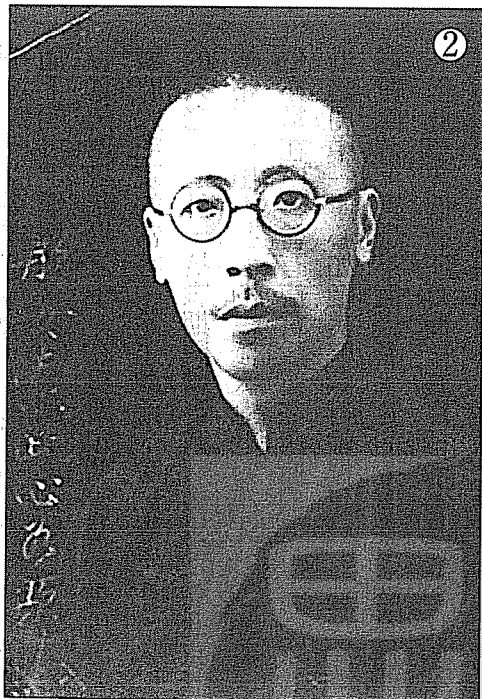
當天晚上我和二舅談天，他問我「下午是什麼人給你拉胡琴？」我說：「是個姓齊的朋友。」他笑道「實在不高明，明明是反二簧，而在過門中拉成了二簧原板，難怪你唱不下去了」，大家大笑，可見他對京戲之內行。有次他與我暢談京戲，告訴我許多掌故十分有趣：

他說我大舅酷好京戲，所以他跟著看，漸漸入了迷，他二人都最喜歡生曲調，故兄弟二人評論前後名角之優劣和輩分，曾評定：余三勝和張二奎是第一代（以前不是崑曲即是徽調）。第二代為汪譚孫三派，汪是汪桂芬，人稱汪大頭，傳人是名角王鳳卿，汪的戲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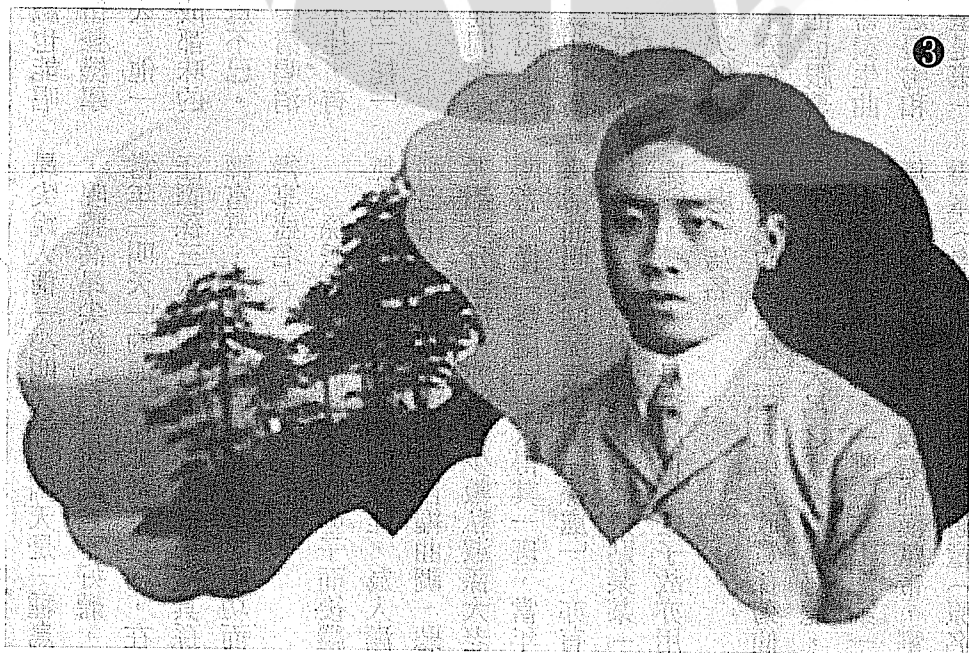
學，傳人不多。譚是譚鑫培，因嗓音高昂尖銳人稱「小叫天」，叫天是一種鳥鳴聲高昂尖銳，只會拔高並不好聽，當年「叫天」的渾名並非恭維之稱，在汪譚孫三人之中實屬末選，後來經其孫譚富英，其徒余叔岩出類拔萃之唱功而得享盛名。

孫派是孫菊仙，因未收弟子而後繼無人，據說孫菊仙的學問極佳，為人瀟灑自由，時常刪改戲詞或自編曲調，聽者都十分激賞，亦曾有少數私淑孫大老闖者，僅「雙處」一人得其一斑，當年孫菊仙唱戲貼海報自稱「孫處」，亦有許多名人票戲不用真名，而只貼某某「處」，雙某人亦是滿族世家之子故亦用「處」為名。

我的大舅和二舅兄弟最欣賞孫菊仙，認為他是洪鐘大呂之聲，最為好聽，故也最捧「雙處」，「雙」在上海第一舞台常演「逍遙津」雙處飾漢獻帝，劉壽峯（名淨角）飾曹操，麒麟童（原名七齡童，亦即周信芳）和楊月樓（楊小樓之父）飾兩皇子，我的兩位舅舅是每演必看。



- ①一九六四年康心如在北京留影。
- ②一九二六年康心如重慶留影。
- ③康心如十九歲時在日本留影。



這些小事看似與二舅的為人處世與事業成就並無關係，但是却可顯示他對任何事都深入理解，並下功夫研究，致

能樣樣精通，更能深藏不露，他為人平易謙遜，從不與人結怨或結仇，實與他一般常識與生活經驗之豐富大有關係。

我的母親是他最親愛的妹妹，我是他最寵愛並寄厚望的外甥。為對二舅之崇敬與敬愛，謹略記其生平以為紀念。